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骆冬青 朱崇才 董春晓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骆冬青 朱崇才 董春晓 著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骆冬青,朱崇才,董春晓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963 - 3

I . ①文 … II . ①骆 … ②朱 … ③董 … III . ①文
艺美学—研究 ②汉字—美学—研究 IV . ①I01 ②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5662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骆冬青 朱崇才 董春晓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963 - 3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42.00 元

一前言一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这一课题，是计划中的“汉字美学研究”的一个开端。

文艺美学，从“感性直观”的哲学角度，研究作为艺术的文学；汉字，是华夏先民创制的以“文”为主、以“字”为辅的“文字”系统，因此，“汉字”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华夏文字”（可简称为“华文”）。汉字学，即是对于“华夏文字”的学术研究。

21世纪以来，文艺美学与汉字学，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坚持“专业性”的前提下，如何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当拓展边界，整合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综合研究，从而在更高层面回归“文史哲”一体化的优良学术传统。

我们认为，从汉字学与美学交叉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开辟文艺美学和汉字学的新领域。

这一新领域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这本书所讨论的“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我们所理解的“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华夏文字”与“感性直观”的交集。这一交集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指华夏先民以感性的方式直观对象世界（包括对象化的人自身），并将这一审美体验凝聚在他们所创制的“华文”中。换言之，汉字是主体感性直观对象世界的产物，代表了主体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

第二，汉字以感性的方式，显现于竹帛、甲骨、金石、纸张、屏幕等器物载体，而我们则可将汉字作为“感性直观”的对象来书写、制作、欣赏和体验。

第三，可以借助凝聚了前人审美体验的汉字，来表达、评论、审视我们自

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直观感受与体验，特别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直观感受与体验，并传达给同样使用这一文字系统的他人。

本书即试图从上述几个层面，开展对于“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这一课题的研究与探讨。这一研究与探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从“图、象、意、音”四个层面，全面而深入地阐释汉字美学的内涵和特质；

其二，以实例阐述汉字美学中的具体问题，诸如汉字在古代器物载体上的感性显现及其发展历程，凝聚在汉字中的华夏先民的审美体验，汉字在发展历程中所不断积淀的审美信息；

其三，试图从美学层面对汉字及其谱系做出新的描述和阐释。

“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这一课题，是我们的汉字美学研究系列的开端部分。这一研究系列，是以“汉字现象学”为理论中心而展开的系列研究计划，其中的部分内容，除本书所涉及的问题之外，尚涉及下列课题：

1. 汉字美学。以研究汉字符号所蕴含的美学智慧为核心，着重探寻汉字造字中体现的中国精神特质。汉字“形音义”合一的特殊形态，使它成为一种极为高级的美学对象。“汉字学”中包含着丰厚的美学资源。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汉字展现的另一种智慧形态需要我们进行美学探索。探寻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美学蕴意，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着重探讨汉字美学的逻辑结构、汉字创生的美学智慧、汉字形态的美学变迁、汉字“书写”与“韵律”的美学研究并对由汉字美学到汉语美学的迁移做初步思考。

2. 汉字现象学。汉字集本质直观与范畴直观为一体，不仅构建了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特殊体系，更凝结为一种哲学，一种特殊的现象学。在历代“小学”及近代以来的甲骨学、简帛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以现象学眼光，审视汉字的哲学意蕴与美学精神，提出在汉字的美学构建中，“图象先于声音，指事先于象形，草书先于正书”等一系列观点，并且就汉字与中国文化诸方面的关系，试图做出现象学的新阐述。

3. 汉字图象^①学。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的能指本身具有审美性。作为一种“多媒体”式的文字，汉字符号本身就形成了美学的本体性特质。汉字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包含着深刻美学创造的心灵过程，“图象先于声音”是这一过程的根本特点。汉字图象学，即运用“图象学”的基本原理，着重研究汉字图象的“生成—还原”，研究汉字从“像”到“象”再到“相”的机制、过程及结果：汉字从具象之像、抽象之象到“抽象”的相，图象灵感构成了汉字创造逻辑在先的重要特征，汉字从“象”立意，包含着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图象思维的“图—式”过程。这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构成了汉字“想象”思维方式的美学特质。

4. 汉字谱系学。汉字作为“有益的传统”，其谱系在文化转型中只能渐进地、部分地重构。在既有的“意义”“部首”“声韵”三大类汉字谱系的基础上，可以建构汉字的美学谱系。这一谱系可按照分类学的一般方法，分为 Class 系、Family 科、Genus 属、Species 种四层级，在系一级可分为“天人、物象、心象、音象”四系。汉字的美学谱系可用“拓扑结构”描述呈现。汉字美学谱系更能接近汉字创制及发展的“原生态”，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可为寻绎天人之间的适当平衡提供资源。

5. 汉字拓扑学。汉字各层级元素及其集合间的关系，用“拓扑结构”这一数学模型来描述，是一个较优的选择。我们所建构的汉字美学谱系，即是将所有汉字及其变换拓展，纳入一个包括树型、环型等结构在内的“拓扑结构”中。这一结构可分为静态、动态两个层面。汉字从“文”到“字”的发展，从初文到定型、变种、变型，从本义到引申义，从本字到假借字，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拓扑变换”，这种变换的特点之一，是每一元素内外关系在变换中保持一种本质的稳定或平衡。汉字拓扑学，即在汉字的创造层面和使用层面，研究汉字静态的“拓扑结构”和动态的“拓扑变换”，描述、模拟、再现汉字的谱系建构及其发展变化，并试图在现当代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哲学方法论的启发引导下，对主体及其对象世界，给出一种具有学术个性的阐释方案。

^① “图象”通常作“图像”，本书在下列特殊场合用“图象”而不用“图像”：1. 表示对于这一概念进行字源学和词源学追溯；2. 在其原初的动词或动名词意义上使用或可活用为使动、意动；3. 表示该词有概念化、符号化、抽象化的含义；4. 作为论证或叙述对象需要使用时；5. 直接引述文字中原作“图象”者。但如特别强调其为通行词汇时，则使用“图像美学”“汉字图像”“图像学”“图像的生成”等。

6. 汉字叙事学。现存的中国文化宏大叙事，存在于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轴心时代的经典文献及新出土的简帛之中，然其可直观的本质及源头，则应从“前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遗存中去寻找，这种文化遗存，学界多注重“神话”“甲骨文及早期金文”“物质形态的考古遗址”这三者，汉字叙事学，即在此三者的基础上，从“知识考古学”角度，抽象出“汉字叙事”这一“文化遗存”，并试图从这一遗存中寻找中国叙事的主要“实事”及其结构形式。汉字是中国叙事最早的载体之一，也是唯一具有逻辑实证性及体系自洽性的知识考古学材料。汉字叙事作为中国经典文化认知的“前理解”，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演化的“初始状态”，并决定了中国文化在此后数千的演化路径。处于中国文化关键地位的十大汉字谱系，构成了中国叙事的主要内容并决定其形式特征。这十大汉字谱系所属的汉字，不但在数量上占常用汉字种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且在整个汉字意义谱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汉字叙事学，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使用新出土文献等材料，对这十大关键汉字谱系所属重要汉字的初文及本义，一一做出详尽考证，并在这一考证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下列十大关键汉字谱系所构成的中国叙事：一、主体层面——人、中、雅；二、对象世界——玄、玉；三、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示、平、商；四、工具——象、易。

这一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计划，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围绕“文艺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这一课题，我们已经发表了近30篇论文。我们现从这些论文中选出部分内容，汇为一处，略做分类，并希望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在逻辑，能够从这些分类及排列中显现出来。

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分别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这些论文，已分别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文史知识》《江海学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

我们的这一研究计划，主要有两个目标：

其一，是在汉字美学研究中，将汉字的诸多个别现象，抽象为“哲学一般”，从诸多相关术语中，提炼出具有特定逻辑关系的核心概念集合，将其上升为“范畴”，操作这一概念范畴系统，构建“汉字现象学”的理论框架，并从“图象”“谱系”“结构”“拓扑”等层面，对汉字这一“现象”做出理论性的描述。

其二，在综合交叉研究中，在汉字学专业领域中取得一定进展，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关键字”的研究中取得进展——以“重文献、重证据、重考证”的专业精神，在“三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引入哲学美学方法，特别是引入康德、胡塞尔、德里达等人的哲学方法为主线的“广义现象学”，在“汉字学”领域，取得专业性的突破。

这本小书和即将出版的《汉字现象学》等书稿，即是向这一目标努力的初步尝试，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骆冬青 朱崇才

2016年6月于南京石头城

—目 录—

前言

第一编 汉字学转向

壹 论中国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1
一、“哲学语法”与“美学文字学”	2
二、“文字”：灵动的美学精神	6
三、“说文解字”：中国美学的生成性	9
贰 论汉字美学的逻辑起点	12
一、字形的原点	13
二、汉字与汉语	17
三、意义的界限	21
叁 图象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	24
一、汉字的图象本体	24
二、像、象、相：汉字的美学飞跃	26
三、汉字“形”“声”的审美奥秘	32
肆 象形、象意与表意——论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	35
一、“三书说”的重新检讨	35
二、汉字审美符号的特殊存在方式：“象”与“意”	37
三、汉字精神现象学：“立象以尽意”	42
伍 “汉字图象”的美学观照	46
一、“汉字图象”：一个民族的“元书写”	47
二、“汉字学转向”中的“汉字图象”	51

三、“汉字图象”与精神现象	54
陆 汉字美学的意蕴.....	58

第二编 汉字美学谱系

壹 中国文化之源：前轴心时代的汉字.....	64
贰 初文与本义的遗传：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字源学追溯”	70
一、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研究对于“文献材料”的路径依赖 ...	70
二、“文字逻各斯”与古代文论概念范畴	71
三、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更远追溯	73
四、汉字逻各斯：初文与本义的遗传	74
叁 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	79
一、既有的汉字谱系	80
二、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	83
三、建构汉字美学谱系的意义	89
肆 汉字之美.....	91
伍 论“婉”：词学核心概念的字源学谱系分析	96
一、“允—宛—婉”谱系字源分析	96
二、“允”族词及词组在词学文献中的使用	99
三、“婉”字的词学意义阐释	104
陆 词学核心概念“婉约”之“约”的汉字美学谱系分析.....	108
一、“约”的美学含义源于“幺—玄”	108
二、“幺—玄”为“蚕吐丝”之象	109
三、《说文》训“玄”为“幽远黑”是否正确	111
四、“幽”即“蚕室”，取“蚕上山吐丝”之象	113
五、“约”自“幺—玄—幽”得义，而用之于词学	116
柒 汉字图像还原与文学接受的一个缺环——以词学核心概念 “雅”字为例	119

一、直观现量与话语蕴藉及概念抽象	119
二、汉字的图像生成与还原	122
三、“小学”的百年缺环与汉字图像还原	130
四、缺环的修补	132

第三编 汉字感性显现

壹 汉字形体美学初论.....	135
一、从书法之美到汉字之美	135
二、汉字之美的两个方面与三个类型	141
贰 汉字形体历史呈现方式及其美学研究观念刍议.....	146
一、美的直观	146
二、美的历程	148
三、美的呈现	156
叁 晋尚韵、宋尚意与汉字之美.....	158
肆 汉字表意及其书写与中国画的传神理念.....	162
一、中国画的“传神”理念	162
二、汉字思维的表意方式	165
三、士大夫文人的书写生活方式和视觉表现方式及其 审美趣味	167
伍 论汉字思维对中国画表现方式的建构	171
一、汉字思维的特点	172
二、汉字思维对中国画表意方式产生作用的机理	176
三、汉字思维与中国画的艺术理念	179
四、余论	183

第四编 美学新视阈

壹 论汉字美学的历史积淀与文献基础.....	185
一、“经学”与“小学”	186
二、“美学”与“汉字学”	190
三、重新发现伟大传统	193
贰 汉字美学：一个新的学术世界.....	196
一、探究“汉字美学”的意义	197
二、汉字美学研究相关范围	199
三、汉字的美学形态	201
四、汉字美学的学术世界	206
五、小结	210
叁 汉字美学研究刍议：以若干词学核心概念用字为例.....	211
一、研究对象：美学视阈中的汉字与汉字学视阈中的 文学话语	212
二、研究内容：理论架构及其前提、背景和应用	215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26

第一编 汉字学转向

壹 论中国美学的“汉字学转向”

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具有人文学科特有的文化差异。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则集中于语言文字。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具有的特殊“不可通约性”在美学上具有深刻的表现。汉字的独特性质，呼唤着中国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的深层背景就在于，其内在核心是“语言”的重要作用。追寻“哲学语法”的结果，是用逻辑方式探寻美学问题，造成一种“范畴误置”。中国传统关于汉字研究的深厚传统，则提示着“美学文字学”的诞生，即以汉字文字学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美学的特质。汉字美学的灵动精神，体现在汉字的“写”，即“草书先于正书”的自由与规范的悖反中，这种悖反赋予了汉字“写”的生长状态，在汉字的“笔意”与“笔势”的流动中凝结。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汉字造字过程的描述，也体现了汉字的生长性。中国美学需要一种哲学的“说文解字”。在从“文”到“字”之间，则为汉字的美学探索留下了更为邈远的空间。

美学，可以划分中西么？还是如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变为一种共通的、普遍的原理？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艺术，似乎在这一点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追求着全人类的沟通乃至共通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丰富的差异性，即由于语言、文化、地域等不同而来的“特别”。审美，似乎尤其如此，“民族的”与“世界的”，总是构成永恒的张力。美学论述，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而来的不同，并不能随着概念和语言的“翻译”而消失，相反，有些概念正因“不同”反而更具魅力。汉语美学，或通常所说的中国美学，既有与

西方美学关注的相同问题，又有与西方美学不同的侧重，乃至具有不可通约性的方面。从哲学上，中国哲学的一些观念、概念，均有其“不可译”的一面；美学上，中国特有的一些“字”“词语”，更是“不可译”的。这里，有着一种文化乃至人类学上的不同体系构成的深刻差异。

不过，这种不可通约的方面，最根本的表现，还是语言文字——构成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的语言文字。美学概念，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可以列出许多，也有一些论述；可是，更深刻、更内在、更隐含的层面，还是语言文字本身。中华“语文”，自有其特定含义，但是却包含语言、文字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仅关系到“说”“听”与“读”“写”的不同，更有其自身的某种联系。特别是深入到文字层面，则汉字与西方文字的差别，更是与哲学思维有着深刻关系。西方的语音本体传统，与汉字“说文解字”的学术传统之间，存在着的差异，在美学上有着深刻的表现。笔者以为，汉字的独特性，呼唤着美学的汉字学转向。这种转向，或许会被认为是中国美学的自我设限或自我膨胀，但是，如果在一种世界性的目光下，以一种生态学的、开放性的心灵，探索中国美学的深层意蕴，则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美学，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西美学的交融和相互激发，丰富人类的美学宝藏。

一、“哲学语法”与“美学文字学”

20世纪西方学术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标志着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集中关注语言；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语言成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与理想语言哲学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发点。这种转向，自然也进入了美学领域。

美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如今似已尘埃落定，尽管颇有成果，最终却只能作为一个支流，其重要性颇值得怀疑。原因在于，语言哲学所追求的语言的确定性，乃至引入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待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含糊，尤其是艺术语言的扭曲与自反、那种无限扩张的想象力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语言哲学的成就，自是在偏重科学的研究方面，而与人文性的研究有很大隔阂。尤其是西方语言哲学，其基础是语言学：西方不可能发展出“文字学”，这是西方拼

音文字的事实决定的。可是，汉字却以文字学为重要学科，“要读书必先识字”，汉字学甚至是最根本、最重要、最蕴藉深厚的学科。因此，汉字、汉语与西方拼音文字以及西方语言体系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那么，研究哲学和美学，汉字以及汉语能够成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向的要素吗？有人说，汉字，不过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表征方式，与西方相比，存在着种种根本缺陷；甚至，应当以“拼音”来取代汉字。这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汉字作为中国智慧的重要根源，不可能也无须用西方的拼音文字取代，相反，应当从哲学、美学上，予以深入研究，发掘汉字独特的智慧内涵，或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打开整个美学领域的另一扇门，为美学乃至哲学开启另一种思路。语言哲学，有必要转向汉字哲学；汉字哲学的主体，当是汉字美学。如果说，西方语言哲学，其根本愿欲乃在于建立“哲学语法”，以一种言说哲学的语法规则，或者说深层结构，来为哲学订立规则，找到千变万化的棋局之下的“棋盘”，那么，汉字似乎一下子让西方哲学看到了“解构”的可能，“无底棋盘下的游戏”被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由此可被解构。如此，西方哲学似乎面临着深刻的挑战：来自“文字学”的挑战。

必须认识到，德里达意义上的“文字学”，与汉字“文字学”尚有诸多不同，德里达未曾学习与研究汉字文字学，故所论颇多空泛。如果说“哲学语法”在西方哲学中，如维特根斯坦等已有深刻论述，那么，美学文字学则尚未开始。汉字美学在与西方美学传统的关系上，显然，应当有更多的路要走。

西方拼音文字的拼音，是以音符为要素而进行的。音符本身，自有其形体结构，如“o”，或以为即表示发音时嘴巴的“圆形”，是一种“象声”。但是，这种形体结构，已从图像、图形向着抽象的形式发展，在极简的化约下，成为抽象的符码。音符数量极少，作为“字母”，所拼出的与其说是“字”，不如说是“词”。也就是说，由26个字母，组成的词汇，作为西方语言中的“文字”，与汉“字”所指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拼音文字所“拼”的“词”，以及这些“词”连接为“句子”，所构成的意义单位，与汉语也是不同的。所以，西方所谓“拼音文字”，其实不是“字”，却是可以很好地表达说话的“语言”的。“说”而不是“写”，在语音中心的层次上，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语言学转向”的深层背景就在于，其内在核心是“语言”的重要作用。而这是西方“语言学转向”无法自己意识到的。潜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内在于其中。所以，在语言哲学中，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逻辑法则，是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词”、句子，却是在一种体系性的句法下审视。因此，语言哲学与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有着密切联系，其根本原因，应与西方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关。语言哲学所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如意义与指称，语句与命题，逻辑语言与逻辑专名，简单命题与复杂命题，人工语言与逻辑语言，言语行为，概念结构，等等，不妨说，都是在认定语言与逻辑有着内在关系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种“语义上行”。

美学的“语言学转向”自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探讨的问题，从“美”的概念，到艺术中的种种，都卓有成效。可是，致命的是，用逻辑方式探寻美学问题，却是一种“范畴误置”，真正的问题有可能被悬搁。讨论哲学、美学的“语言学转向”，如果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笼罩下进行，就难以做出自己的思考。其实，“语义上行”固然可以解决哲学上的一些问题，美学上，“语义”往往却还是限制在原本语境中思考才是恰切的。“上行”的结果，可以进行哲学抽象，却改变了其原初情境与语境。但是，西方的语言学思维，却在一种科学的语境下，顺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道路必然“上行”。当语言哲学关注日常语言，关注语言现实的诸多问题，关注悖论、可能性、不确定、隐喻等问题时，思考的维度似乎指向了一种新的空间，一种“非逻各斯中心”的空间。

德里达提出的“文字学”似乎挑起了对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反抗。德里达在《文字学》开头，引用卢梭《语言起源论》里的话：“这三种书写方式与人类据此组成民族的三种不同状态完全对应。描画物体适用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用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用于文明民族。”^①德里达反感这种“语音中心”的傲慢与偏见；卢梭的描述中，包含着的内容似乎应当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去除其臆想的成分。可是，德里达未曾通晓汉语，尤其是汉字，这就限制了他的思考。尽管在《文字学》中汉字、汉语是必须得注意的对象，西方许多学者也都对这种“异文化”符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汉字“文字学”知识的缺乏，却使得他们的论述往往似是而非，乃至悖谬。德里达的“文字学”亦然。他的“文字学”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有人译为“文迹学”；或许，翻译为“文字学”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意。所以，我们无须因汉字的“文字学”传统而为之欢呼雀跃。汉“字”与汉“语”、“语言”与“语文”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是西方语言与“文字”所不具备的。因此，哲学上

^①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页。

的“语言学转向”能否顺畅地“转”到中国文化的语境，就应当首先打上一个问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许多学术研究方法，都来自西方。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随着汉语本身的“西化”似乎已经有部分消解；但是，汉语与西方语言的不同，却无法以西方语言研究成果为“通天塔”来解决，相反，也许需要对其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在“语言学”上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成果。在“文字学”上，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与西方恰成一个重要的对比。重视乃至珍视这一传统，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广义的文化上，或许都可打开新的空间。当然，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董作宾说：“本来，世界上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后来，西方的文字，完全变为‘音符’，用以拼音，已失去图画的意义；中国的文字，在3000年前的殷代，也已由图画变成了符号，把‘音符’和‘意符’同时保存。这种符号，完全用线条书写，呈现出刚健与柔媚等不同的姿态，每个字的结构都不一样，一些象形字更接近大写意的原始图画，看起来非常美观，写起来就特别能表现书法的美。”^①董作宾的说法，似是表现了汉字独特的美学性质，虽然其论汉字特质尚需要进一步阐述或深化，但是，这种美学上的体会，却未能回答黑格尔的问题，即汉字是否也像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或者说，作为一种非拼音文字，同样由“象形”而来的汉字，是如何拥有另一种智慧？它与西方的智慧不同吗？汉字建立了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的“文字中心”思维方式吗？沉默的汉字，“写”出的“话语”，与西方“表音文字”所“说”出的“话语”一样吗？汉字本身的美学，与以汉字为思考媒介的美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需要思索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相对于西方语言，汉字与汉语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关系。着力解决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思路。汉字，更当做深层次的思索。莱布尼兹以为，汉字似乎是“聋子创造的”^②，“……汉字也许更具有哲学特点并且基于更多的理性考虑”^③，似是提示了汉字具有的哲学深度。董作宾的思索，相较之下，似乎缺少了哲学意涵，但是在美学上，却颇值得重视，因为所论中表现出来的对汉

^① 董玉京：《甲骨文书法艺术》，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②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③ 同上注，第116页。